

## 瞧这老哥儿仨

——记清华“大家唱歌咏队”指挥小组

○周 全（1948经济）

我家靠墙的多宝柜中，有一张三人合影（见下图）。三个老头笑眯眯肩搭肩抱在一排，看到照片的老友们常会说：瞧！这老哥儿仨，多乐！这三人是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园“大家唱歌咏队”的指挥小组成员。右边是方堃（胡积善），中间是周全（周汝汉），左边是严宝瑜。这是三个志同道合的老党员，是胜似兄弟的战友。到清华百年校庆时，我们的革命友谊已超过一个甲子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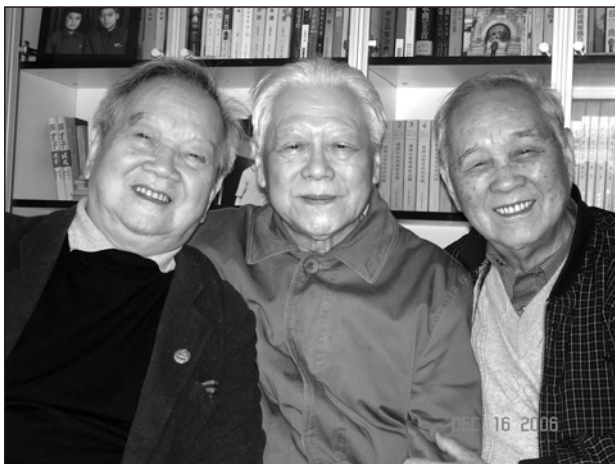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还得从头说起……

志同，我们是在1945年西南联大“一二·一”运动血与火的斗争中相识的。当时牺牲的“四烈士”使我们震惊、激愤、奋起。我们一起参加了护校斗争，一起唱着严宝瑜谱写的《送葬歌》走上昆

明山城的街头，并用《茶馆小调》、《你这个坏东西》、《跌倒算什么》的歌声，唤起民众，抨击发动内战的反动派。我们遵循周恩来同志关于“要把革命的歌声传到北方去”的指示，把“红歌”带到复员后的清华园，带到北平古城。志向相同，要开辟解放全中国的第二条战线。

道合，我们三人都酷爱音乐，爱唱中外的进步歌曲，特别是中华百年的革命歌曲。同时，也喜爱中外的古典音乐。严宝瑜曾在重庆中央音乐学院学习，能指挥、作曲。方堃是音乐世家，拉得一手好胡琴，擅长指挥。周全曾在云大附中师从赵沅（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），参加过“山城合唱团”和“贝多芬音乐小组”，有一定的声乐和指挥基础。志趣相同，自然就走到了一起，并被推举进了指挥小组。

“大家唱歌咏队”是清华复员北平后，学生中的第一个进步社团，是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下的群众组织。1946年底，在一个雪花纷飞的日子，有四个年轻人在清华学堂北侧工棚的小屋里聚在一起。我们三人当时都是“民主青年同盟”的成员，还有一人是已入党的骆宝时同志。骆宝时宣布



“大家唱歌咏队”的民青小组正式成立。骆宝时已是清华地下党南系学生支部的总支委员，通过他先后直接由总支负责人刘新（陈彰运）和查汝强领导开展各种活动。这个民青小组成为歌咏队的核心。

三年爱国学生运动中，“大家唱歌咏队”参加了几乎所有的活动，我们哥仨儿始终站在集会游行的前列。第一次演出是在清华大礼堂举行的纪念“一二·一”周年文艺晚会，方堃指挥演唱了《东方的暴君》、《茶馆小调》等；严宝瑜指挥演唱《送葬歌》、《跌倒算什么》等；我担任了独唱和男女声二重唱。演出非常成功，吸引了许多进步同学。第二次演出是与燕京大学联欢，在这次萤火晚会上，除歌咏表演外，我和方堃、骆宝时、黄培正还化妆跳了新疆歌舞《青春舞曲》。这是由戴爱莲派人来校教授的，深受两校同学喜爱，开了演出民间舞蹈的先河。年底，北平各校进步社团在北大四院礼堂办了新年晚会，演唱了解放区传来的许多歌曲，如《山那边呀好地方》、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，并将《白毛女》第一幕改名《年关》演出。待反动派知悉赶来捣乱时，晚会已经结束，各回学校了。

从“抗议美军暴行（沈崇事件）”起，歌咏队走在历次运动的前头。在“五·二〇”反饥饿、反内战游行中，在“助学运动”上街募捐中，在“于子三事件”的抗议游行中，在“四九血案”反美扶日游行中，在1947年、1948年“北大民主广场”命名和支援东北学生的“七·五事件”中，“大家唱歌咏队”都起到带头作用和宣传队的作用。参加的同学越来越多，最多时达到四百多人。

1948年，“八·一九”大逮捕后，方堃和我先后被党组织送回解放区。方堃如愿以偿在平山中央党校参加了文工团，进城时指挥了在长安戏院演出《赤叶河》的乐队。我留在华北局城工部工作，组织了纪念十月革命节晚会，指挥了《国际歌》和几首解放区歌曲的演唱。严宝瑜留在学校，组织大一同学参加的“新生歌咏队”，和“大家唱歌咏队”一起，活跃校园的生活。在解放初期，严宝瑜受刘仁同志委托，在干部学习班中组织了歌咏活动，三个人一直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。

晚年，这老哥仨儿又续写了音乐人生的夕阳红。1980年，中央领导同志授意，清华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和中组部老干部局局长郑伯克，通过不同渠道找到我们三人，建议由原“大家唱歌咏队”发起，联系当年北平各大学歌咏队筹备一台晚会，纪念“一二·九”运动45周年和“一二·一”运动35周年，我们十分赞同。毛主席曾高度评价过这两次学生运动，称为“第二条战线”的斗争。

经过联系，和当年北大“沙滩歌咏队”的杨文浒（杨圣力）、南开“南星合唱团”的苗晶、燕京“高唱队”的王广荃等同志一道发起，聚集了几十个年近花甲的老队员练歌。经过半年筹备，在共青团中央大力支持下，一台纪念晚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演出，十分成功。参加演出的各校同学一致同意在北京成立一个“老同学合唱团”，将当年的红歌传唱下去，决心唱到2000年。如今，这些年近九旬的老人还在练歌，每逢“五四”青年节和各校庆典，还被邀去演出，几乎演遍北京大、中学校，还演到延安、昆明、杭州，参加全